

WUSI YISHI YU ZAOQI ZHONGGUO XINSHI

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

熊辉/著

 人民出版社

WUSI YISHI YU ZAOQI ZHONGGUO XINSHI

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

熊 辉 / 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熊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1-009439-7

I. ①五… II. ①熊… III. ①新诗-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2208 号

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

WUSI YISHI YU ZAOQI ZHONGGUO XINSHI

熊 辉 著

责任编辑:陈晓燕

封面设计:中联华文

出版发行:人民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 65250042/65289539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3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 张:18.25

字 数:302 千字

书 号:ISBN 978-7-01-009439-7

定 价:38.50 元

序一 译诗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毛 迅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中，五四时期无疑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阶段，可以认作是中国新诗的“创业期”。在翻译文学的演进历程中，五四译诗与清末译诗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五四时期的译诗者是站在“他文化”的立场上采用白话自由诗形式去翻译外国诗歌的，不像清末翻译人士难以摆脱传统诗歌形式的束缚。而正是五四时期的翻译诗歌在形式、语言和精神上为早期中国新诗创作确立了范式，使之有了明晰的参照，即便今天，中国新诗的发展还在沿袭五四时期译诗影响下开创的诗歌之路。因此，熊辉博士的专著《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考察译诗在发生期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是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之旅。

首先，从译诗研究现状出发，本书在五四文化语境中去探讨译诗对中国新诗在语言表达、诗体形式、创作等方面形成的影响，具备了较多的创新元素。从民族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除理论外，就作家作品而言，应由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和翻译文学五个单元构成。”（贾植芳：《译介学·序一》）但当代撰写的文学史却很少承认翻译文学在民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人为地将翻译文学这个“单元”驱逐出了文学史的家園。再就翻译文学史的撰写情况来看，在翻译文学史中，译诗也没有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明明对中国新诗影响深刻的译诗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就译诗的研究而论，五四前后译诗的研究主要是倡导新诗学习译诗，是新诗对译诗影响的主动接受。20世纪80年代以后，译诗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译诗的标准、语言、形式以及和原作的比较等方面，相对于现代译诗研究而言，译诗的影响研究反而削弱了，很少有文章专门谈论译诗尤其是五四前后的译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除了卞之琳在宏

观上谈到了译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之外，其他的研究大都着眼于某个诗人的译诗或译论研究，而且除廖七一先生的文章谈到了胡适的译诗对创作的影响外，其他研究很少将诗人译诗与创作的关系联系起来，难以见出译诗对新诗创作的结构性影响。因此，总体而言，五四译诗的影响研究还有待深入和拓展，《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所从事的相关研究打开了一个具有很大增长空间的学术领域。

其次，研究方法也赋予了本书诸多的创新亮点。此前学术界对翻译诗歌的研究主要是借用了国外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将翻译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到语言和技巧层面上，至于翻译对诗歌文本的选择、传播、接受和影响等重要问题则被有意无意地遮掩了起来。文化翻译研究学派理论的兴起改变了翻译研究的对象和重心，突破了翻译文学文本的局限而将社会体制、价值观念、民族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等文化形态联系起来，使文学翻译研究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前景。文化翻译研究将会使被遮掩的资源回归到翻译研究的正题，诗歌的翻译目的、制约译诗翻译的因素、译诗对我国新诗的影响、译诗对我国新文化的影响等问题便成为本论文的重要内容。在比较文学媒介学的基础上产生的译介学（*medio-translatology*）“是对那种专注于语言转换层面的传统翻译研究的颠覆”（曹顺庆：《比较文学论》）。译介学“把翻译看作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对象，它把任何一个翻译行为的结果（也即译作）都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在乎这个结果翻译质量的高低优劣），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它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和分析”（谢天振：《译介学》）。所以相对于传统的语言研究来说，译介学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诗歌的研究有了学理和方法上的归宿。这些研究方法必然为本著作带来新的研究视角、内容和观点。

最后，就具体的研究内容来看，本书也具有很多创新点。在第一章中，之前很少有人对文学社团及其刊物上的译诗进行过详细具体的梳理，也很少有人从翻译的角度去考察早期主要诗人的作品中存在的译诗痕迹，这不仅从影响对象的角度为探讨本论题奠定了基础，而且这种梳理研究本身就具备了创新特征和开拓价值。第二章从翻译学的角度探讨了五四时期的译诗语言观，丰富了翻译学和语言学的内容。而且本章对新诗语言欧化的认识也远远超越了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而是从汉语自身的兼容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方面重新认识了欧化现象，这是比较独到的欧化认识观。第三章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从翻译自身的

困境和中国新诗发展需要上去认识译诗对中国新诗形式的影响，突破了那种只注重从模仿层面来论述新诗形式丰富性的根源。第四章分两个层次论述了早期诗人的创作与译诗的关系：部分诗人直接阅读并翻译了外国诗歌，译诗对他们创作的影响主要停留在翻译过程或思维转换上；也有部分诗人是通过阅读其他人翻译的诗歌作品而真正受到了译诗文本的影响，这部分人也包括那些参与翻译实践的诗人，因为他们可能会阅读别人翻译的诗歌，从而避免了先前相关研究的笼统性。第五章“潜在译诗对早期新诗创作的影响”应该是整部专著的亮点，因为目前的翻译研究还没有明确提出“潜翻译”这一关键词，而它又是影响中国早期新诗创作最主要的翻译类型。第一节从学理上探讨了潜翻译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翻译类型；第二节论述了早期很多诗人都依靠这种翻译来从事新诗创作，使其成为一种创作手段；接下来的第三节则以早期有代表性的诗人为个案，实证性地考察了潜在译诗对译者创作的影响。这种研究在之前的翻译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中都是没有过的。第六章中也闪现出一些创新观点，比如认为五四译诗除了对语言、诗体形式和创作产生局部影响外，还帮助贫弱的中国新诗确立了文坛地位，刷新了中国新诗的形式观念，促进了中国新诗现代性的进程，等等。

总之，《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从译诗的角度研究中国新诗发生期受到的外来影响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也为我们从事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译诗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新诗以及从中国新诗的角度去返观译诗，必然会使中国新诗研究和翻译诗歌研究获得崭新的视角，进而取得相关研究的诸多新鲜认识，这应该是本书的旨趣所在。

序二 翻译要谈，不翻译更要谈

赵毅衡

熊辉是我见到过的青年学者中，读书最勤，思索最深，最不惮资料之烦琐，又沉醉于理论的快乐。我说这话不是奖励，而是钦佩：眼前的这本书，想必能让读者们同意我的说法。

真理往往是最明晰最简单的，虽然真理要一本好书才能说得清楚。记得俄国理论家罗曼·雅克布森有一句话，“能指必是可感知的，所指必是可翻译的”。与所有真正的名言一样，说的是常情常理，细想却明白深意无穷：能指可以感知，这感知如何而得，就不是我们能规定的：“无物之象，恍兮惚兮”，只要有“象”，哪怕恍惚，也必有深意。对于受国外影响，我们有作家诗人的自白文字，也有他们的作品为证。把话说得大大方方，把话说得躲躲闪闪，或干脆一句不说，都是对于治翻译史者的挑战：广征博引收罗证据，有意义；蛛丝马迹剔抉幽微，更有意义。既然“不说”能够被感知，不说就有意义，不说的原因更有意义。

而中国文学史，长期把翻译文学这一大块搁在外。这空白本身，也证明治文学史者识见有所短，能力有所缺，言说有所忌，心有不可道之隐。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影响，至今没有被充分地综合到先到文学史中，这背后也有一定道理。近年这方面似乎有所突破，出现了一些功力扎实的研究，而熊辉的这本书，更以资料翔实，论证周密，迥出流辈。不过我猜想，现代文学史一直苦于材料几乎用尽，不得不在旧材料里翻箱倒柜。看到熊辉的这本著作，就遇到了一位潜心于深山几年后归来的探宝者。你可以自己走不进这大山里去，你不可能忽视这位探宝者慷慨地给你看的如此多珠玉富矿。

而且，熊辉发现了一条巨大的矿脉，藏量远远超过已发现的已勘探的，会有不少人入“金山”继续探索下去：熊辉用书的三分之一篇幅，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极大地扩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那就是“潜翻译”。熊辉指的是五四时期的诗人明显地读了某些外国诗，没有翻译成文，但留在脑中的印象极深，最后在创作中浮现出来。谓予不信，熊辉手里拿出实证：在私信里谈过所受影响的《红烛》之源头；连私信里也没有说所受影响的《死水》之由来。

当然，说闻一多未受外来影响独立创作的学者，可以继续打笔墨官司。他们没有受影响的宣告就是无影响，从文本对比里看出“潜翻译”，证据不足。而且这种说法，似乎含沙射影，说闻一多译过草稿，没有拿出来，索性改写成自己的诗。按我的理解，熊辉的潜翻译概念，不是如此简单：潜翻译是一项非常高贵，独创性很强的思维活动。潜翻译，就是真正的理解。明白地说：所有的理解，都是翻译；要理解，不可能不翻译；一旦理解了，就是潜在翻译，早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显露出来。

因此，读懂了一首诗，就是在脑子中做了一道翻译，自己对自己说：哦，原来如此，我明白了：“白发三千丈的意思是，就是某某意思”，每个人不同的理解，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唯一的不可能的理解方式，是“白发三千丈的意思就是白发三千丈”。

这就让我们回到了本文开始所引雅克布森的话：对某件事，某个文本，理解了，脑子中必定做了一道“翻译”，必定另一套语汇解释了一遍。这“另一套语汇”不一定是另一种语言，当然不排除另一种语言。“可译性”指可以用语言解释，也包括可以用另一种符号再现。任何一个思想不可能纯然地呈现为思想，它必然需要表现，而“理解”就是给它另一种表现：不可能用原表现方式理解一个表现。皮尔斯说“每个思想必须与其他思想说话”，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诗人读懂了一首外文诗，就有极大可能是用中文想了一遍，而且很可能用的是诗的语言，谁叫他是个诗人呢？很可能用中文诗的语言想了一遍，谁叫他是个中国诗人呢？

熊辉提出的“潜翻译”，我的理解就是诗人读外国诗的过程。如果这个过程被永远搁置，永远忘却，倒也让文学史无话可说，但是偏偏熊辉研究的是中国现代诗的开山始祖，他们的思想过程，他们的所思所虑，构成了我们今天无法摆脱的传统。

而且“潜翻译”这条矿脉绵延深长：雅克布森说的这“翻译”，并不一定是语际翻译，还可以是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翻译”。与五四时期诗人作家相比，当代的诗人作家对外国诗题目令人注目地噤若寒蝉。五四诗人作家几乎个个精通外语，几乎个个大谈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感受；而且几乎个个动手翻译，译者兼作者是五四本色行当，这传统一直延续到卞之琳、钱钟书，一直延续到穆旦、陈敬容。难得有不懂外语的，如汪静之，也不惮坦言，说自己勤读别人的汉译。

而中国当代诗人作家呢？难得遇到一两个诗人作家懂外语，要肯兼做翻译的，是特例中的特例。是不是当代文学不受外国文学影响呢？表面上的确如此：几乎没有一位当代作家诗人，像五四时期一样津津有味地谈外国诗佳作。我们都明白，这背后的原因实际上很俗气：如今不同于五四时期，译本太多，而译本人人能读，有什么可炫耀的？

套用布鲁姆“影响焦虑”之说，我称之为“影响势利”（Snobbery of Influence），好像非要上西奈山得到十诫的摩西，到还道村庙中得到九天玄女天书的宋江，才用作宝贝，随时说起。但是人人可得，不等于人人有悟。不翻译不等于他们就摆脱了翻译，只要他们读译本有所感，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一样是参与了翻译影响本国文学的过程。

中国人读了某些外国诗有所感，不是他们喜欢上这几个外国诗人，而是这几个外国诗人喜欢上了他们。某些外国诗人回答了他们心中的某种呼唤，用“显翻译”或“潜翻译”的方式，在他们心中创造了某种共鸣。而这种共鸣的余音，一直缭绕到我们的文学传承中，到我们今天的文学活动中。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忽视这么重要的一大块文化活动？中国现代文学史不研究这一块，如何能自称完整？

这就是为什么熊辉的这本书值得好好读，尤其是值得关心中国诗的朋友好好读。至于治中国文学史的学者们，他们今天可以不读，明天可以不读，不可能后天也不读：因为那时候他们的学生都读过了。

目 录

序一 译诗与中国新诗的发生（毛迅）	1
序二 翻译要谈，不翻译更要谈（赵毅衡）	4
绪 论	1
第一章 五四新文化语境中的译诗	22
第一节 五四时期的译诗热潮	22
第二节 五四译诗的时代特质	42
第三节 早期中国新诗中的译诗痕迹	46
第四节 译诗：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影响的中介	74
第二章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语言表达的更新	78
第一节 五四时期的译诗语言观	78
第二节 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语言的欧化	85
第三节 日语对早期中国新诗语言的影响	104
第四节 译诗与中国新诗语言表达方式的更新	111
第三章 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的诗体形式	132
第一节 译诗与自由诗	132
第二节 译诗与现代格律诗	138
第三节 译诗与散文诗	145

第四章 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创作	158
第一节 译诗与中国新诗创作的关系	158
第二节 译诗对非译者创作的影响	164
第三节 译诗对译者创作的影响	170
第五章 潜在译诗对早期新诗创作的影响	176
第一节 潜翻译：一种客观存在的翻译样式	177
第二节 作为诗歌创作手段的潜翻译	189
第三节 潜在译诗对译者创作的影响	195
第六章 五四译诗对早期中国新诗的整体影响	218
第一节 五四译诗与早期新诗文体地位的确立	218
第二节 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更新	226
第三节 翻译的现代性：五四译诗与早期新诗的现代性	236
结 语	245
参考文献	250
附 录 五四时期主要期刊译诗篇目	259
后 记	277

绪 论

一

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在民族文学步入暗淡和萎靡境地时，通过引入外国文化为民族文学的发展带来清新之风；通过消除语言隔阂让译语国读者领会异国文化风情和精髓，进而在宏大的文化比较视野中体认到本民族文化的发展路向。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期，外来压力和自身需求营造了翻译文学的黄金时代，生机勃勃的文学翻译活动加速了中国各体文学的新变。“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化，在变革时每有外来的潮流参加进来。外国的文化成为触媒，成为刺激，对于本国文化引起质变。”^① 中国新诗能够在五四时期真正地确立起自己作为文类的地位其实与五四前后译诗所起的“触媒”作用密不可分。

译诗刺激了清末民初僵化和“不合时宜”的民族诗歌，奠定了新诗发生和发展的基础。谭嗣同为代表的“新学诗”派以音译新词汇入诗，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为诗开辟新意境，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倡导“我手写我口”，均未能使中国诗歌摆脱困境。晚清“诗界革命”的失败无可争辩地说明了内部的改良和革新不可能复现中国诗歌的唐宋荣光。中外诗歌发展的历史说明，要使中国诗歌朝着符合时代要求和民族审美的方向继续前行而“永葆青春，万

^① 郭沫若：《再谈中苏文化交流》，陈玉刚著：《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第 7 页。

应灵药就是翻译”^①。奥克泰维欧·派茨（Octavio Paz）曾这样论述了翻译诗歌对译语诗歌的促进作用：“西方诗歌最伟大的创作时期总是先有或伴有各个诗歌传统之间的交织。有时，这种交织采取仿效的形式，有时又采取翻译的形式。”^②我国现代著名的翻译家郑振铎先生把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和创作看成是文学家“两重的重大责任”，并认为翻译文学是民族新文学和新文体建立的基础：“无论在哪一国的文学史上，没有不显示出受别国文学的影响的痕迹的。……威克利夫（Wyclif）的《圣经》译本，是‘英国散文之父’（Father of English Prose）；路德（Luther）的《圣经》译本也是德国的一切文学的基础。”^③五四时期的译诗同样促进了中国诗歌的新变，没有译诗，新诗“新纪元”的到来会无限期的推迟；没有译诗，新诗的发展就不会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交织的文学地图上找准自己发展的方位。正是译诗将外国诗歌的形式、语言、表达方式和新思想等直观地呈现给了国内读者和不谙外语的诗歌创作者，才为新诗创作在民族诗歌传统之外另辟蹊径，走出了晚清以降诗歌创作举步维艰的泥沼。

五四译诗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和表达。五四时期的诗歌翻译在语言上声援了中国的白话新诗运动，使中国新诗的语言染上了浓厚的欧化（准确地讲是外化）色彩。朱自清认为译诗“可以给我们新的语感，新的诗体，新的句式，新的隐喻”^④。任何民族的语言在同其他民族语言的交流过程中都会受到影响，而翻译在引入外国诗歌时也自然会丰富我国新诗语言的词汇，这些词汇不完全是音译外来语，其中也有根据本国语言意译外国新思想、新观念而产生的新词汇。20世纪初在翻译诗歌中引入或产生的词汇几乎是伴着中国现代汉语的产生而同时出现在中国新诗中，它已经成了中国新诗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的诗歌创作离开了这些词汇就难以进行。翻译外国诗歌不仅为中国新诗带来了大量的新词汇，而且由于翻译表达的需要和原语构词的特点，中国新诗语言的构词方法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也是中国新诗语言欧化的表现。中国新诗诗行的变化一方面是由诗歌节奏和诗歌情感的变化引起的，另

① 季羡林：《我看翻译》，许钧主编：《翻译思考录》，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② Octavio Paz, *Translation: Literature and Letter*, 参见王克非编：《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54页。

③ 郑振铎：《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改造》杂志第3卷第11期，1921年7月15日。

④ 朱自清：《新诗杂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2页。

一方面也与句子表达方式的变化有关。中国新诗语言的欧化除了体现在词汇、词法上之外，在句法上也有非常明显的表征。五四时期，使用欧化的文法句式成了诗歌创作的时尚潮流：“现在白话诗起来了，然而做诗的人似乎还不曾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所以他们宁可学那不容易读又不容易懂的生硬文句，却不屑研究那自然流利的民歌风格。”^① 我们必须在承认外来影响的同时认识到中国新诗语言不可更改的特性，才能够使中国新诗在借鉴译诗的基础上焕发民族光彩。

五四译诗促进了早期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演变。1898 年是中国翻译史上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的翻译成就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模式：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不仅为政治小说的翻译作了学理上的倡导，而且开启了中国翻译文学的功利性目的；严复《天演论》的出版宣告了“信”、“达”、“雅”必将成为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的理论圭臬；林纾翻译的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次年出版时改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改变了人们对外国文学的偏见并提升了翻译文学在中国的地位。翻译文学促进了中国现代新文学多种文体的发展。首先就戏剧而言，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戏剧新品种话剧是在“建设西洋式新剧”^② 的号召下发展起来的“一种西方戏剧形式”^③，翻译戏剧对它的影响程度可想而知。就小说而言，它作为叙事文体原本遭受歧视，而清末兴起的小说翻译热潮使其地位经历了从侍从到显贵似的戏剧转变。在论述小说盛行的原因时，陈平原先生认为“域外小说的输入是第一推动力”^④，“不得不把域外小说输入造成的刺激和启迪作为中国小说嬗变的主要原因”^⑤。新诗发展所获得的推动力、刺激和启迪其实与戏剧、小说一样，其源动力来自中国诗歌内部的裂变和外国诗歌的翻译。中国新诗文体发展演变的轨迹其实就是外来诗歌影响的轨迹：“五四运动产生了许多诗歌流派，比如浪漫主义诗派（郭沫若），大众化诗派（刘半农），小诗派（谢冰心），湖畔诗派（冯雪峰），新古典主义诗派（冯至），新格律诗派（闻一多），革命诗派（蒋光慈），象征主义诗派（戴望舒）。

① 胡适：《北京的平民文学》，《胡适文存二集》卷4，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

② 鲁迅：《〈奔流〉编校后记（三）》，《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

③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④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⑤ 同上书，第20页。

总之，这些诗派和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外国诗歌（包括东方和西方的诗歌）的启示和影响。”^① 据此，有学者认为应该从接受西方诗歌影响的角度来撰写新诗发展史：“如果编这样一部文学新诗史也是很好的，即从新诗接受西方诗歌影响的角度来编写，考察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到底接受了多少西方的影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哪些影响的接受较为成功，哪些则只起迷惑的作用。”^② 总之，“新文学的小说、诗歌、戏剧形式上较多舶来品，借鉴外国从头做起”^③，新诗也不例外，没有五四译诗，现代新诗至少不会如此迅速地与传统诗歌拉开如此大的审美距离。

五四译诗除了在文学层面上对早期新诗文体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进作用外，还在思想层面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当然，这反过来又会在精神价值层面上引起中国诗歌的新变。比如五四前掀起的拜伦（Byron）翻译热潮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需要爱国精神和反抗精神。1908年鲁迅发表在《河南》月刊上的《摩罗诗力说》第一个介绍的就是具有反抗和正义精神的“恶魔”诗人拜伦，他后来解释拜伦受到中国读者欢迎的原因时说：“其实，那时 Byron 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④ 拜伦“热情真诚的自由信仰者”形象和“为自由而奋斗的爱国者”^⑤ 形象符合当时人们对中国人形象的构想，拜伦诗歌的翻译介绍正好契合了他们的偶像崇拜心理，所以，拜伦诗歌更多的是在思想而非文学上影响了中国。浪漫主义诗歌在中国的大量翻译其实也主要是社会原因所致，中日甲午海战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处在一个传统秩序解体的时代，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到了五四时代，一大批知识分子纷纷献身于艺术，其中有很多人像鲁迅一样是从其他领域转入文艺的。这种态度恰恰反映了一种浪漫主义的价值观：艺术被认为比科学更重要。”^⑥ 他们大量翻译浪漫派诗歌的出发点不是

① 刘重德编著：《文学翻译十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3 年版，第 164 页。

② 林庚：《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 页。

③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7 页。

④ 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20—221 页。

⑤ 苏曼殊著，啸霞译：《潮音集·自叙》，贾植芳、陈思和主编：《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1898—193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4 页。

⑥ 乐黛云、王宁主编：《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9 页。

“转移性情”而在“改造社会”。^① 后来文学研究会对外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翻译介绍,对弱小民族文学的关注等顺应了中国文学“关注人生和现实”的社会目的,至于文学本身则考虑得并不多。文学文本是思想的载体,外国诗歌的翻译必然会为中国社会引入新思想和关于社会、人生的新理念。正是这些新思想和理念的引入,才在内容乃至思维方式上为诗歌和其他文学样式的新变开辟了又一条路径。

译诗既以“他者”的身份通过外部影响来促进民族诗歌的发展,又以民族诗歌构成要素的身份直接参与民族诗歌的建构。五四时期的很多诗歌翻译者本身就是诗人,著译不分是五四时期译诗的一大特征。“我们对彼时文人‘翻译’的定义,却须稍作厘清:它至少包括意译、重写、删改、合译等方式。”^② 翻译文学在当时融入了译者的很多主观思想和译语国的文化因素,含有较多的创作和译语国文化色彩。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许多新诗创作者视译诗为创作作品,将其收入自己的作品集中,比如新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就收入了《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等翻译诗歌。“新文学作家中,假借外国文学之手催生创作的并不鲜见。边译边创作,互为推动,极其普遍,很少有只著不译或只译不著的作家,相反,二者是相互渗透,合而不分。结果,许多作者将个人的中文作品及外国译作合并成集出版,形成现代文坛的又一景观。”^③ 近年来,随着翻译文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在翻译文学的国别归属上基本赞同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译入语国文学)的说法。贾植芳先生说:“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的、以汉文形式存在的外国文学作品,为创造和丰富中国现代文学所作出的贡献,与我们本民族的文学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④ 谢天振先生说:“既然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独立的存在形式,既然它不是外国文学,那么它就该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翻译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⑤ 胡适依靠《关不住了》这首译诗来确立了新诗的“新纪元”,有力地说明了早期诗人不仅视译诗为创作,而

①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页。

② [美]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页。

③ 王健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④ 贾植芳:《译介学·序一》,谢天振著:《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⑤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

且在新诗建设贫弱的时期，他们只能依靠译诗来证明新诗的成就。因此，翻译诗歌作为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直接建构并证明了新诗的艺术价值。

译诗对早期中国新诗的积极影响毋庸置疑，“我们几乎可以武断地说，没有翻译，五四的新文学不可能发生，至少不会像那样发展下来”^①。同样，没有译诗，中国新诗就不会有横向的发展参照；没有译诗，中国新诗就不会在文体和语言上与传统诗歌发生巨大的裂变；没有译诗，中国新诗作为文类的确立就不会如此“匆忙”，中国诗歌的新变还会经历更加漫长的摸索期。

二

译诗对民族诗歌乃至民族文学发展新变的推动作用早已是学术界的共识。然而，译诗的研究现状与译诗应有的学术价值之间极不对称，译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研究十分薄弱。

首先从民族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翻译文学应该成为文学史书写的重要内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除理论外，就作家作品而言，应由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和翻译文学五个单元构成。”^②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海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等都把翻译文学网罗进了文学史的观照范围。但当代撰写的文学史却很少承认翻译文学在民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人为地将翻译文学这个“单元”驱逐出了文学史的家园。“自 1949 年以来大陆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无一例外地取消了论述翻译文学的专门章节，不仅如此，他们对作家们的翻译成就不是轻轻地一笔带过，就是视若无睹，缄口不谈。譬如，皇皇二十卷的《鲁迅全集》，其中一半是译作，而且鲁迅又有很高的翻译成就和不少关于翻译的真知灼见，又如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作家，他们的译作都相当丰富，但所有这些在我们的现代文学史上却几乎找不到他们的踪迹。”^③就连目前影响较大的文学史著作如钱理群等人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① 余光中：《翻译和创作》，《余光中谈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2 年版，第 36 页。

② 贾植芳：《译介学·序一》，谢天振著：《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 页。

③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08—210 页。